

总 论

中国经济增长对亚太分工的影响

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成为全球经济中的一个热点。世界各国关注中国的经济增长，除了希望从这种增长中获得一些启示外，更多的是因为由这一增长所带来的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正在改变着这些国家或地区与中国的关系。对这一问题尤其关心的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即 APEC 的成员，因为这些国家或地区与中国的经济贸易和投资关系最为密切。

中国经济增长对 APEC 成员的影响集中表现为由这种增长所导致的中国出口的高速增长和结构进步改变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改变了中国与 APEC 成员的产业分工关系，改变了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因此，研究这一变化的特点与性质，分析这一变化所产生影响的范围，确定这一变化影响的程度，无论对于中国来说，还是对于 APEC 其他成员来说，在发展战略的制定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无疑应当充分利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根本优势，实现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的持续发展。在今后几年内，尤其要实现贸易结构的持续进步，加深与 APEC 成员的分工合作。有效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应当基于对地区贸易分工的现状与趋势的充分认识。这一战略的基本点是，中国不仅要注意与 APEC 成员双边贸易关系的发展战略，而且要注意整个地区分工结构的发展走向，把国内产业发展与对外贸易结构进步建立在 APEC 分工发展的基础之上。

第一节 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特点及其 对 APEC 经贸关系的影响

无论是就国内社会经济变革来说,还是就对外关系和国际地位的变革来说,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是 80 年代以来中国变化的核心。这种持续高速增长得益于改革开放,而影响到所有各个领域。就对外经济关系的性质、规模而言,这种增长的影响尤为显著。

一、高速增长:中国对外经贸关系发展的基础

中国对外经贸关系的发展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外贸的高速增长,二是外资的大量流入,三是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扩大。从机制上看,导致对外经贸关系发展的原因是改革与开放,从数量上讲,其原因则在于经济的总体规模的迅速膨胀。在过去 18 年中,中国几乎保持了二位数的经济增长。(附表 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国内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是对外经贸关系的持续高速发展的基础。

二、结构进步:中国国际分工地位变化的原因

在总量增长的同时,中国经济的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七五”到“九五”规划的 15 年中,第一产业的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下降了 9.5 个百分点,而第三产业则上升了 9.7 个百分点。(附表 2:中国经济的结构进步)第一产业比重的下降使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间的产值之比从 1:1.61 转变为 1:2.35。制造业比重的提高成为中国出口结构变化从而国际分工地位变化的根本原因。

三、外贸扩大 中国经济开放型增长的特征

在经济总量增长的过程中,对外经济关系以更高的速度发展。这一变化的结果是国民经济外贸依存度的不断提高。出口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从 1978 年的 4.62% 上升到 1995 年的 21.37%,进口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从 5.17% 上升到 18.96%,外贸依存度从

9.80%上升到 40.33%。其中 1994 年更高达 43.72%。从 1985 年起整体外贸依存度超出 20% 而从 1991 年起,整体外贸依存度超出 30%。(附表 3: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与外贸依存度)作为大国,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无疑是较高的。高度开放的美国外贸依存度仅为 10.6%(1993),日本仅为 9.5%(1993)。除了以转口贸易为特征的国家或地区外,这种水平的外贸依存度一般是新兴工业化经济的特点。

上述特点决定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尤其是中国与亚太地区的经济关系。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开放政策吸收外资为 APEC 成员的结构进步作出了贡献。

在开放政策下实现的中国经济增长对于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 APEC 成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的开放首先是对外来投资的大规模吸收。这一开放特征的结果是中国成为 APEC 成员的重要投资场所,成为这些国家和地区产业转移的重要目标。不仅中国的外资主要来自于 APEC 成员,而且中国也已成为 APEC 成员的主要对外投资对象。90 年代以来的统计显示,除了港台对大陆投资分别居第 1、第 2 位以外,在外来投资中,韩国居第 6 或第 7 位 泰国居第 8 至第 10 位,日本居第 2 至第 4 位,美国居第 3 至第 4 位。在中国利用的海外直接投资中,来自 APEC 成员的比重,1991 年为 88%,1992 年为 93.07%,1993 年为 92.39%,1994 年为 90.74%。(附表 4:APEC 成员对中国的直接投资)

中国在 APEC 成员对外投资中的这种地位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对于这些国家、地区的结构进步具有重要作用。中国通过外来投资发展起一大批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成熟的制造业,改变了国内的产业结构。在这一过程的同时,也为投资来源国创造了传统产业向外转移的机会,使这些国家和地区获得了新产业发展的空间。从这

个意义上无疑可以说，中国的对外开放是 APEC 成员产业结构进步的重要因素，也是这一地区分工格局变动的决定性因素。

第二 外贸扩大为 APEC 成员的持续增长提供了动力。

中国对外开放 18 年来，外贸出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与此同时，进口也以同样甚至更快的速度增长。从 1979 年到 1995 年这 17 年中，中国外贸顺差共 7 年，平衡 1 年，逆差 9 年，总逆差达到 146.3 亿元（附表 5：中国进口量与外贸差额）

与此同时，在中国吸收外来投资中相当一部分是设备投资。这表明，吸收外资成为投资国或其它国家的重要出口机会。在“七五”期间，外商作为投资进口的设备额为 138.8 亿美元，占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的 35.56%；在“八五”期间，外商作为投资进口的设备额为 683.4 亿美元，高达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的 42.43%。（附表 6：对华投资中外商作为投资进口的设备金额和实际利用外资金额比较）

中国大陆市场成为 APEC 成员的一个重要出口市场。除了香港的特殊贸易关系和台湾、文莱未获得数据以外，在所统计的 1994 年 14 个 APEC 成员中，对中国大陆出口占其总出口比重 2% 以上的有 9 个，其中韩国更高达 6.46%，日本为 4.71%，澳大利亚为 4.27%。（附表 7：APEC 成员对华出口在各自出口中的比重）

中国对外贸易投资关系的这一结构特征表明，中国经济增长使世界市场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强有力的竞争者，然而同时也出现了一个更强有力的购买者。中国通过其在世界市场上作用的这一特点对各国经济的增长作出了贡献。开放经济的宏观分析证明，出口大于进口通过需求总量的提高对国民收入的提高产生积极的作用。研究亚太经济近年来的高速增长必须充分估计中国经济增长和市场容量的扩大所起的作用。

第三，中国已在一个较深的层次上参与了国际产业分工。

对外贸易投资关系发展的直接结果是中国与世界各国尤其是 APEC 成员间国际分工关系的加深。中国出口在国际市场上的位次从开放初期的 1980 年的第 26 位上升到 1986 年起的第 16 位, 1989 年起的第 14 位和 1992 年起的第 11 位。^⑩ 中国的出口总值从 1978 年的 99.55 亿美元上升到 1995 年的 1487.97 美元。这一发展使中国出口占 APEC 的比重从 2.46% 上升到 6.68% ,在全球的比重从 0.80% 上升到 2.97%。(附表 8 中国出口总量在 APEC 中比重的变化)

第二节 中国经济的开放型增长与中国 在 APEC 分工中的地位

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一种开放式的经济增长。这种经济增长的特殊性在于,增长不仅扩大了中国自身的经济规模,而且加强了中国与各国的经济关系,其中尤其是加强了与 APEC 成员的经济关系。通过地区内的产业转移,通过国内的结构调整,中国形成了与 APEC 成员新的分工体系。

一、APEC 成员对中国的产业转移

中国开放以来,吸收了大量外来投资。特别是 90 年代以来 中国成为全球主要的国际资本吸收国之一。对中国的投资大部分来自于 APEC 成员。1994 年中国利用的海外直接投资中,来自 APEC17 个成员的投资额按实际利用外资数计算为 285.57 亿美元,占全部外资的 84.57%;按协议外资计算为 721.66 亿美元,占 87.28%除香港、台湾以外,主要投资者为美国、日本、新加坡和韩国。(附表 9:中国利用外来直接投资中 APEC 成员所占的比重)

中国吸收外资的直接结果是实现了国内,尤其是沿海地区的结构进步。而对于投资方来说,则适应了这些国家地区产业向外转移,进行结构调整的需要。通过对中国投资,APEC 一些成员把一批传统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进而在全球产业调整

中发展起一批新兴产业。

APEC 成员对中国的大规模投资是这一地区分工变化的重要因素。在 80 年代以来的中国外贸发展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由外资企业所提供的,或者是来料加工型的贸易方式。

因此,现行的中国出口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是过去 18 年这一地区产业转移的结果。这一点本身决定了中国与 APEC 成员的分工的几个基本特点。第一、中国的出口产业在结构水平上低于 APEC 对中国的投资成员,出口的发展不构成对投资成员的竞争威胁;第二、出口产品流往投资成员的传统市场,改变了产品的供应者但不改变原有的竞争格局;第三、中国出口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地区分工的深化过程,其中包含着投资成员的产业进步,分工的发展是互补程度的提高。

二、中国对外贸易的结构进步

开放型的增长导致了中国经济在增长中的结构进步,也表现为对外贸易的结构进步。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变化的主要特征是初级产品在总贸易额中的比重下降,而工业制成品的比重上升。从 1980 年到 1991 年,初级产品的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从 50.3% 下降到 16.3%,进口占进口总额的比重从 34.8% 下降到 14.2%。同期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比重从 49.1% 上升到 83.7% 进口比重从 65.2% 上升到 85.8%。但是,出口增长中的结构进步并不是巨大的。初级产品出口比重的下降主要来自三个方面:1、“食用及主要供食用的活动物”的比重从 16.5% 下降到 8.3%;2、“非食用原料(燃料除外)”从 9.5% 下降到 3.4%;3、“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从 23.5% 下降到 3.4%,是初级产品中比重下降最大的一部分。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的上升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1、“机械及运输设备”从 4.7% 上升到 18.1%;2、“杂项制品”从 15.7% 上升到 41.3% 二者分别上升了 13.4 个百分点和 25.6 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尽管出口产品的结构获得了进步,机械产品出

口有了较大的增长，但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是杂项制品。化学及有关制品的出口还有所下降。

与此同时，进口结构的变动却突出显示了对机械及运输设备需求的增长，这一部分的出口比重从 25.6% 上升到 44.6%，上升了 19 个百分点。进口比重的下降主要来自于两个部分：1、“食用及主要供食用的活动物”从 14.6% 下降到 2.7%；2、“非食用原料（燃料除外）”从 17.8% 下降到 6.4%。（附表 10：中国进出口商品的结构进步）

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出口的结构进步仍然是有限的。在对出口增长作出主要贡献的“杂项制品”中，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一般制成品。1994 年“杂项制品”出口总值为 496.43 亿美元，其中：卫生水道、供热及照明装置 8.25 亿美元，占 1.67%；“家具及其配件”14.93 亿美元，占 3.01%；“旅行用品、手提包等”23.65 亿美元，占 4.76%；“服装及衣着附件”237.31 亿美元，占 47.8%；“鞋类”60.42 亿美元，占 12.17%；“专业科学及控制用仪器装置”6.21 亿美元，占 1.25%；“摄影器材、光学物品及钟表”26.44 亿美元，占 5.33%；“杂项制品”119.22 亿美元占 24.02%。前五类显然属“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共计占 69.47%^②。中国出口商品的这一结构水平既是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反映，也是外来投资产业水平的反映。

三、中国在亚太经济中地位的变化

由于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国在亚太经济中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整个亚太经济中的比重提高。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 APEC 的比重，1995 年为 4.60%，而在 1985 年为 3.82%，1990 年为 3.08%。由于这些比重是按当年人民币对美元的平均汇率计算的，在这一期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从 3.20 下降到 8.31，因此实际中国经济在 APEC 中的比重还要大一些。（附表 11：中国经济总量在 APEC 中比重的变化）

但是 中国在 APEC 中地位的变化主要还是总量性的。中国通过自己的高速增长提高了这一地区的整体增长率，通过市场容量的扩大为其他成员的增长作出了贡献。总量增长主要来自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改革所释放的社会生产力，二是开放所引导的外来投资。不论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还是出口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外来投资的结果，因而在增长中包含着结构的限定因素。在外来投资中，除了一批重大项目由国家产业发展战略规划所决定外，大量的中小型投资项目是 APEC 其他成员产业转移的结果，而国内各地区争相吸引外资的直接结果不仅导致了利益外流，而且使产业发展被动地服从于投资者的需要。因此，尽管从中国自身来看 18 年来的结构进步与总量增长一样是显著的，但相对于投资国（地区）来说 结构进步又是从属的和滞后的。APEC 其他成员的产业结构进步更为显著。也就是说，中国的生产与出口的增长增强了中国的整体实力，但尚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相对地位。

四、中国与 APEC 分工体系

大量吸收外来投资的更深层的结果是中国被纳入跨国公司的国际生产体系之中。众所周知，由于跨国公司的大发展，国际分工深化。国与国之间的分工，一方面是由比较优势决定的最终产品分工，另一方面也是大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经营战略的体现。这就形成了更深层次的国际分工。许多国际大公司都在中国进行了投资，其中尤其是 APEC 成员的跨国公司。在这些公司中，有美国的通用汽车、福特汽车、IBM、通用电气、惠普和美国石油公司等，有日本的三洋、松下、日立、东芝、NEC、三菱、夏普等。在世界最大 30 家商业银行中有 19 家在上海设立了分行，其中日本有 11 家。

大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事实表明，需要从一个新的视角估计中国在地区分工中的参与度。贸易是商品流动，而投资是要素的流动和国际组合。中国通过提供劳动力和市场为跨国公司的国际投

资创造了条件。如果说开放初期外来投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话，那么现阶段投资的产业水平正在不断提高。一批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新产业新产品的投资正在成为新阶段中国引进外资的特点。大跨国公司的投资与中小企业的产业转移性的投资不同，其更注重全球市场战略和新产品的开发，这种投资特点为中国产业结构的进步和国际分工地位的提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第三节 中国与 APEC 成员分工关系的性质与特点

经过开放后 18 年的发展，中国与 APEC 成员之间究竟形成了一种什么样的分工关系，这是探索中国贸易发展战略与参与 APEC 合作战略的基础。研究表明，中国与 APEC 成员间形成了一定水平的双边专业化分工关系，但是整体贸易结构的互补水平并不高。中国提高了其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但是出口集中在少数低层次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上，整体竞争力不强。中国的整体出口发展迅速，但是由于其出口产品的结构特征、地区分布与产业分布，对 APEC 新兴工业化经济与发展中国家有利面大于不利面。中国在出口产品的结构上体现了一定的比较优势，但是这种比较优势的产业分布与其经济规模和出口规模相比仍然是不相称的。

一、中国与 APEC 成员的双边贸易特征

中国与 APEC 成员的双边专业化指数较好地反映了中国与各国、地区的分工特征。双边专业化指数为各类商品的进出口贸易差额与进出口贸易总额之比。对 SITC0 类至 8 类的全部一位数和 6、7、8 类的部分二位数（共 24 个类别）的双边专业化指数的分析表明，中国与 APEC 成员间存在着一定的专业化分工。1991 年，除了 5 类、6 类产品外，其余 22 个类别产品的双边贸易专业化指数，在 17 个成员中均有 10 个以上成员的绝对值大于 0.5，5 类、6 类则均为 7 个成员。从国别、地区结构来看，与中国大陆有较明显专业化分工关系的有泰国（在 24 个类别的产品中有 18 类双边专业化

指数绝对值在 0.5 以上), 印度尼西亚 (19 类), 马来西亚 (16 类), 菲律宾 (20 类), 新西兰 (18 类), 日本 (20 类), 加拿大 (21 类), 智利 (17 类), 墨西哥 (19 类) 和巴布亚新几内亚 (19 类) 共 10 个成员。(附表 12 中国与 APEC 成员的双边专业化指数 (1991))

在 90 年代初的几年中, 中国与 APEC 各成员的专业化分工呈现有所减弱的趋势。根据 1994 年的统计计算, 上述 24 个类别中, 共有 14 个类别为 10 个以上成员的专业化指数在 0.5 以上, 其余 10 个类别专业化指数在 0.5 以上的均在 10 个成员以下 (因 1994 年数据缺少台湾和文莱, 这里按假定二者不变统计)。从国别、地区构成来看, 双边专业化指数在 0.5 以上的有印度尼西亚 (19 类), 菲律宾 (17 类), 新西兰 (16 类), 智利 (19 类), 墨西哥 (17 类) 加上台湾共 6 个成员, 其余 18 个成员双边专业化指数在 0.5 以上的商品类别均较少。(附表 13 中国与 APEC 成员的双边专业化指数 (1994)) 可见, 经过 90 年代初三年的发展后中国与 APEC 成员仍然呈现一定的专业化分工关系。需要指出的是, 这里取 0.5 为分析指标本身并不表明一种较高的专业化分工水平。这是因为在专业化指数的绝对值为 0.5 的时候双边贸易仍然有三分之一的重叠^③。从表 12 和表 13 来看, 中国与 APEC 各成员的双边专业化指数在 0.8 以上的并不多。这说明, 在一位、二位上双边专业化水平并不高。

另一方面, 双边专业化指数下降的现象也表明, 双边贸易结构存在着趋同现象, 这是 APEC 成员产业结构趋同的一个表现。然而, 专业化指数下降并不能绝对地看作分工的减少, 而只应看作基于要素禀赋的互补性分工的减少。由于各自产业结构的进步, 低位数上专业化分工的下降中可能包含着高位数上产业内分工的加深。

二、中国出口增长的结构特征及其意义

在中国 80 年代以来的出口增长中, 有相当一部分是来料加工

性质的出口增长。加工贸易占贸易总额的比重,1986年为18.6%,1995年为45.54%,几乎接近一半。整个“七五”期间平均为40.94%,而整个“八五”期间为47.64%。(附表14中国出口贸易方式构成)出口增长的这种结构特点意味着,表面上看中国的出口增长形成对APEC成员的竞争压力,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竞争压力。但事实上,这一增长的背后是其他APEC成员的经济与贸易的增长。这些成员通过与中国的加工贸易,不仅获得了中国廉价劳动力的好处,降低了生产成本,而且维持了其传统市场,赢得了高额利润。中国出口增长中所包含的不只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而且包含着地区分工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即中国廉价劳动力与新兴工业化经济的市场资源、管理方式和技术品牌的结合。APEC投资成员与中国的分工是生产经营中软要素与硬要素之间的垂直分工。这是中国参与地区合作的一个重要特征。

这一分工特征对于中国开放初期从内向型经济走向外向型经济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使中国在短期内发展起一批以海外市场为对象的加工工业,获得了海外市场。但是从长期发展前景来看,中国的出口发展是脆弱的。中国的出口总量中近一半的市场、管理和技术等关键要素控制在外方合作者手中,中国所承担的只是其中的实际制造过程。在经营全球化、生产经营软要素日益重要的发展趋势中,中国的这种分工地位是相对不利的。

三、中国与APEC成员竞争的地区分布

中国生产与出口的高速增长引起了APEC成员的极大关注,这种关注尤其在于中国出口增长对他们所形成的竞争压力上。研究表明,中国出口增长与APEC发展中成员或新兴工业化经济的竞争,并不表现在这些成员的境内市场上,而是表现在第三方市场上。这是因为。在中国最大的15个出口市场中,仅有4个是欧美日发达市场经济以外的国家或地区,即香港、台湾、韩国和印度尼西亚。其中香港一直是大陆的出口市场,而香港进口中的相当一

部分商品是转口美国的。台湾和韩国是中国大陆近年发展起来的出口市场，在“七五”期间还分别只占中国大陆出口总额的 1.06% 和 0.58%。印尼在上述 15 个成员中排列最后，其与中国的贸易总额仅为中国进出口总额的 1.20%。15 个市场占中国出口总额的 84.91%，因此可以说，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对于亚太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工业化经济的竞争，主要是在发达国家即第三国市场上，而不是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境内市场。（附表 15 中国的主要出口市场）

中国出口市场的这一地区特征同时也表明，中国对外贸易仍然过于集中于少数国家地区；“七五”与“八五”期间，香港、日本和美国三个市场和进出口总量分别占贸易总量的 57.7% 和 54.5%。这对外贸的进一步发展是不利的。与此相应，中国与 APEC 其他成员的贸易关系仍然相对不足。除以上三大成员外，“七五”与“八五”中国与 APEC 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进出口总量仅分别占 8.53% 和 16.8%。“八五”比“七五”的增长主要是与台湾和韩国贸易的增长。因此与 APEC 成员的贸易合作仍然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四、中国与 APEC 成员竞争的产品分布

中国究竟在哪些产品上相对于 APEC 其他成员具有更大的竞争优势，这是分析 APEC 贸易关系的又一个重要环节。从具体的出口商品结构看，中国与 APEC 成员的竞争关系主要在 SITC 一位数的第 6 类“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第 7 类“机械及运输设备”和第 8 类“杂项制品”。在第 6 类上，中国、韩国、印度和智利均有占各自出口量较高比重的出口；在第 7 类上，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日本、墨西哥和美国均有占各自较高比重的出口；在第 8 类上，中国、香港和泰国均有占各自较高比重的出口。但如果再进一步看 SITC 二位数则可发现，这种竞争关系主要集中在第 65 类“纺织制成品及有关产品”（中国、香港和

韩国);第 76 类“电讯器材及收录放设备”(中国、香港、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和墨西哥)第 77 类“电力机械、电器”(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日本、墨西哥和美国)第 84 类“服装及衣着附件”(中国、香港、韩国、泰国、印尼和菲律宾)。这反映了中国与亚太经合组织成员之间竞争关系的主要内容。(附表 16:APEC 部分成员竞争关系的产品分布)由于该表数字是按占各成员本身出口比重计算的,因而竞争关系反映的是对各自的重要性,而不是相对竞争力的大小。

从产业分布可见,中国与其他 APEC 成员的竞争主要是纺织品与电器,竞争对象主要是新兴工业化经济。这种竞争特征反映了发展阶段的相似性,一方面是生产出口大量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纺织品与服装上,另一方面是电子、电器产品的发展。尽管在后一领域 77 类中包括日本与美国,但事实上存在着产品等级的差别即产品档次上的互补性。

五、中国产品在 APEC 市场中的竞争地位

中国各类出口产品在 APEC 市场上的比重可以表明中国在 APEC 中的竞争地位及其性质。研究证明,在 SITC 一位数上,中国仅在“食品与主要供食用的活动物”(0 类)“动植物油和脂”(4 类)和“杂项制品”(8 类)共三类商品上居地区出口比重的前三位,部分 SITC 二位数和三位数统计显示,中国主要在纺织品出口上占重要地位。在 0 类产品上,中国出口占 APEC 出口总值的比重为 11.5%,在各成员中居第三位;在 4 类产品上,中国出口占 APEC 出口总值的比重为 9.79%,在各成员中居第三位;在第 8 类产品上,中国出口占 APEC 出口总值的 22.72%,在各成员中居第一位。在 84 类(服装及衣着附件)、652 类、654 类和 658 类产品上,中国出口占 APEC 出口总值的比重分别为 41.76%、34.70%、37.38% 和 53.40%,均为地区出口的第一位。此外,65 类(纺织物制成品及有关产品)、651 类、653 类和 659 类,中国均为第

二位, 比重分别为 22.36%, 20.76%, 17.81% 和 32.03%。(附表 17 中国各类商品出口值占 APEC 出口总值百分比)

可见, 尽管中国出口总量发展迅速, 并进入全球贸易大国的行列, 但是真正在 APEC 市场上有竞争地位的产品只在纺织品及杂项制品, 其中大部分是服装、鞋类等劳动密集型产品, 其他有一定竞争地位的食物类初级产品。这种结构与一个贸易大国和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目标是不相称的。

六、中国与 APEC 成员的贸易互补性

从出口结构看, 中国与 APEC 成员的关系主要是互补的。这一结论来自于贸易结构的相关性分析。

APEC 各成员间的互补与竞争关系的相关系数的计算方法是, 首先在 SITC 一位数上计算出各国分工的专业化指数, 然后再根据各成员在各类产品上的专业化指数计算出相关系数, 可得到表 18 的结果(附表 18 中国与 APEC 成员贸易结构的相关性)。在这一表中, 皮尔逊相关系数正值表明两成员间贸易结构具有相似性, 从而具有竞争关系; 接近于正 1 则为相互间竞争性很强, 负值表明两成员间贸易结构具有差异性, 从而具有互补关系; 接近于负 1 则为相互间互补性很强。数据表明, 在中国与其他 13 个 APEC 成员的贸易结构相关性中, 8 个为负相关, 即互补关系, 5 个为正相关, 即竞争关系, 而其中最高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仅为 0.636(与泰国), 双侧显著水平为 0.048。而与其他 12 个国家地区则都不存在着明显的竞争关系。然而与此同时, 中国与各成员间的互补程度也并不显著。与日本的互补相关系数在 -0.351, 双侧显著水平仅在 0.320。

这一统计检验同时说明了 APEC 中其他成员间的较为明显竞争互补关系。澳大利亚与香港之间的互补系数达到 -0.740, 显著水平达到 0.014; 与日本的互补系数达到 -0.651, 显著水平为 0.041; 与新西兰的竞争系数达到 0.746, 显著水平为 0.013。智利

与新西兰的竞争系数为 0.689 显著水平为 0.028。印度尼西亚与菲律宾的竞争系数为 0.637 显著水平为 0.048。日本与韩国的竞争系数达到 0.768 显著水平达到 0.010。这一研究结果表明,在整体上说 APEC 成员间的竞争互补关系并没有普遍的意义,互补性或竞争性更多地体现在某些具体类别的产品上。

就与中国竞争系数较高的泰国而言,对贸易产品的具体分析又显示较高的互补关系和互补关系的变动。在中泰双边贸易中,互补关系在 0 至 9 类中的几乎每一类中都有表现,其中 0、1、3 类少些,2、5、6、7、8 类十分明显,只有 4、9 类没有出现(附表 19:1992 年中国对泰国出口贸易互补性指数;附表 20:1992 年泰国向中国出口贸易互补性指数)在中国向泰国出口的主要产品中,不少具有较高的产业内贸易指数,有的达到二位数,而且这还是在 SITC 四位数上的分析(附表 21:中国对泰国主要出口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附表 22:泰国对中国主要出口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这一案例事实上表明,随着研究分类的细化,互补性可以得到较好的体现。

七、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发展的影响

尽管中国的出口发展速度很高,但增长的主要贡献来自于劳动密集型产品。从 1965 年到 1990 年,出口总值的增长速度为年均 16.6%,其中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的年均增长速度为 20.5%,高于平均速度 3.9 个百分点,而资本密集型制成品出口的年均增长速度为 10.9% 低于平均速度 5.7 个百分点。从 1980 年到 1990 年,出口总体增长率为 16.0% 而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的增长速度更高达 23.6% 高于平均速度 7.6 个百分点,资本密集型制成品出口的增长速度则下降为 8.9% 低于平均速度 7.1 个百分点(附表 23:中国出口按要素密集型计算的比重)

中国的这一出口结构产生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形成对 APEC 其他成员的竞争压力,这是自然的。尤其是由

于中国的出口集中在少数几类主要产品上，影响更为明显。但是，国际上一些学者认为，这已经导致 APEC 其他成员，特别是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成员贸易条件的恶化，却是没有充分依据的。统计表明，APEC 成员的贸易条件并没有因为中国出口增长而明显恶化（附表 24：APEC 成员的贸易条件）以 1987 年为 100，从 1985 年到 1993 年，中国的贸易条件从 109 下降到 101，同期印度尼西亚是恶化的，从 145 下降到 90，马来西亚也是恶化的，从 114 下降到 99，墨西哥从 145 下降到 99，但菲律宾是改善的，从 99 上升到 117，中国台湾省从 85 上升到 112，韩国从 94 上升到 100，但 90 年代起是恶化的。事实上在这一时期，低收入国家总体上贸易条件是恶化的，从 111 下降到 94，高收入国家总体上是改善的，从 94 上升到 99，东亚及太平洋地区总体上也是恶化的，从 111 下降到 101。因此，在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大量出口期间，APEC 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国家、地区并未普遍出现贸易条件恶化的现象。

但是应当承认，中国的贸易条件在这一时期是恶化的，并且其主要原因之一确实是出口价格水平下降的结果。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的是中国国内的原因。第一，这一时期的外来投资大部分来自于香港、台湾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转移的同时也带来了出口市场。第二，出口发展的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农村经济改革后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而这些企业的生产水平大部分限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第三，与大量发展起来的产品出口相伴随的是各地区的出口竞争，在销售技术局限、市场有限的情况下，对外的和相互间的价格竞争成为主要竞争手段，导致出口产品价格水平的下跌。

八、APEC 成员在地区贸易中的比较优势

在近年来的发展中，APEC 日益成为一个区域化的市场，内部贸易不断扩大。在地区贸易分工中，各成员的显性比较优势是分工

结构的一个重要指数。显性比较优势为一国某类商品的出口值占该国出口总值的比重对世界（或一特定区域）市场该商品出口总值占世界（或该区域市场）所有商品出口总值的比重之比。本研究以 APEC 为特定区域市场，以 SITC 的 0 类至 8 类全部一位数和部分 6、7、8 类二位数的商品种类为分析对象。研究表明，按商品种类看 国别 地区 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较高的（取前三位）：

在 0 类商品中为新西兰（8.0928），智利（4.5016），泰国（3.8638）。

在 1 类商品中为新加坡（1.8460），美国（1.8231）和智利（1.7012）。

在 2 类商品中为智利（6.6968），新西兰（5.0674）和澳大利亚（3.8572）。

在 3 类商品中为印度尼西亚（7.4332），澳大利亚（4.4067）和墨西哥（3.3794）。

在 4 类商品中为马来西亚（11.8741），菲律宾（6.4890）和印度尼西亚（6.0307）。

在 5 类商品中为美国（1.5640），新西兰（1.1353）和韩国（0.9643）。

在 6 类商品中为智利（2.7531），韩国（1.9760）和印度尼西亚（1.9488）。

在 65 类商品中为韩国（3.2274），中国（2.8301）和香港（2.4054）。

在 67 类商品中为韩国（2.5843），日本（1.9914）和澳大利亚（1.2692）。

在 69 类商品中为中国（1.6978），韩国（1.4984）和墨西哥（1.3375）。

在 7 类商品中为日本（1.5133），新加坡（1.3457）和墨西哥（1.1273）。